

國際標準書號與預行編目之回顧與展望

兼賀國家圖書館八十周年館慶

王振鵠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

✿ 國家圖書館的社會文化功能

國家圖書館除了肩負其他圖書館所具備的一般性功能以外，它還有具有若干特殊的職責，諸如國際圖書交換、協助漢學研究、推動合作編目以及提供國際標準書號和預行編目作業，這些特別的功能強化了國家圖書館作為一國文化表徵的角色；而合作編目、國際標準書號以及預行編目三者間彼此息息相關，兼有「國際化」和「標準化」的雙重特色，後兩者更因為和圖書出版關係緊密，而尤具有社會文化服務的角色與功能。

民國 77 年，在我任職中央圖書館館長期間，行政院核備中央圖書館負責推動並執行國際標準書號，次年成立「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推行「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與「出版品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CIP）」，兩項作業實施至今已二十餘年。回顧當年在籌備階段時，內部人力物力俱缺，而館外又無奧援，堪稱筚路藍縷，而如今坊間所銷售的圖書，皆於版權頁印有國家圖書館預行編目資料，並在封底清楚標示 ISBN 的條碼及數碼資料，不但大幅加速圖書銷售、盤點及訂購的程序，並且劃一編目紀錄，可見此兩項作業實施之後，對各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102）年適逢國家圖書館成立八十周年，國家圖書館多次向我約稿。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實為館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特以此文回顧既往，並展望未來，藉賀館務日新又新。

✿ 國際標準書號之作用

「國際標準書號」係針對圖書提供一套編號制度，配付每本書一組惟一的識別代號，流通於國際間，它於 1972 年被訂為國際標準，並成立國際標準書號總部，以謀推廣。「出版品預行編目」係由圖書館將出版品於正式出版前預先編目建檔，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新書編目卡片制度。前者協助出版業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統一標準作業制度，以利圖書的自動化管理；後者則是圖書館編目標準化的產物，既可作為書目控制的工具，又可達到合作編目的目的。兩者分別源自於出版業以及圖書館各別的需要，但不約而同的都受到「文獻處理標準化」的影響，亦即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所倡導的「資源共享（Resource Sharing）」及「出



版國際利用 (Universal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 UAP)」這兩項觀念。我曾於民國 67 年撰寫〈「出版品編目」計畫及「國際標準書號」〉一文，(注 1) 當時認為這是「圖書館界與出版界合作進行的兩件事」，並且萌生在國內將兩者結合為一，以利圖書館的「書目控制」(Bibliographical Control)。所謂「書目控制」意指利用書目所包括的訊息，據以掌握出版品的內容、資訊和出版消息，以發揮書目的功能，進而達到上述「資源共享」及「出版品國際利用」的目的。

推動實施，創始維艱

民國 66 年，我到中央圖書館服務，到館後面對人力經費不足、館舍不敷以及圖書館作業自動化等若干重要問題，乃陸續推動館舍遷建、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並成立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其中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一項，由民國 69 年起，分成三個階段進行，分別是第一階段擬定標準和規範，第二階段建立中文圖書資料庫、第三階段建立圖書館管理系統，這三階段的工作為日後的預行編目以及國際標準書號的實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民國 75 年中央圖書館新館遷建完成，且自動化基礎具備，即針對國際標準書號的實施、預行編目制度的推行乃至於合作編目的建立等重要館務進行具體的規畫和評估。若由「書目控制」要達到「資源共享」之境地，必須透過「國家書目控制」；所以 IFLA 力倡各國分別成立「國家書目中心」，並建立「國家書目資訊體系」。編製國家書目當為國家圖書館的基本要務，國家書目的完整端賴書刊呈繳工作的良窳，此與國際標準書號和預行編目的實施彼此間環環相扣。

中央圖書館早於民國 70 年即向國際標準書號總部申請到臺灣的出版地區代號 (即「957」)，並與出版界及政府有關單位連繫，希望儘早在國內實施，但當時社會認知不足，出版界反應冷淡，中央圖書館針對出版社所發問卷回收只有 40%。兩年後，即民國 72 年，大陸也取得地區代號 (即「7」)。當時國際環境嚴峻，國內又缺乏統籌主管機關，情勢令人焦灼。之後先經中央圖書館主動邀請教育部社教司、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新聞局出版事業管理處、中央標準局、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等相關政府與民間機構共同商研，終由教育部與行政院新聞局進一步洽商各有關機構，而於民國 77 年 7 月間，由行政院正式核備中央圖書館擔任國際標準書號的執行機構。

民國 77 年 9 月，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研究小組完成《國際標準書號實施及推廣工作研究報告》，研究小組包括館內外相關同仁，研究報告針對國際標準書號與出版品預行編目作業之制訂與實施提出若干具體的結論及建議事項，附錄並列有作業實施具體構想的諸項表格，如出版機構代碼、申請表單……等。此研究報告資料翔實，具體可行，對日後的正式實施幫助甚大，參與工作在短時間內竭智盡力，完成研究，貢獻殊深。

四、承先啟後，屢有新猷

民國 78 年 7 月，我屆齡退職，回返師大任教。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既籌備有年，各項業務於是次第開展，胡歐蘭、鄭恆雄、李莉茜諸位主任以及之後若干主管和同仁相繼承先啟後，新猷不斷，包括列為國家標準、編印宣導刊物、舉辦業界座談、開發電腦軟體、建置網頁，以及在莊芳榮館長任內策劃編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年度參考工具書選目》，近年來更持續刊載書評、推廣社會閱讀，並與出版界密切連繫，且利用 ISBN/CIP 資料庫內新書書目進行學科出版調查，又協同採訪組建置「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等。凡此，足可見業務推動日新又新。

前於民國 88 年，我曾應邀撰寫〈從書目控制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一文〉，(注 2) 文末提及廣邀各科專家學者編輯學科入門選讀書目，此議可集館內外眾人之力完成，當有助於國家圖書館對社會文化、出版文教以及各圖書館之貢獻與服務。

注 釋

1. 王振鵠，「出版品編目」計畫及「國際標準書號」制度——圖書館界與出版界合作進行的兩件事，出版之友第 6 期，民 67 年 3 月，頁 16-17。
2. 王振鵠，從書目控制談《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總號第 3 期，民 88 年 3 月，頁 1-3。